

文史博览

瞿秋白之女瞿独伊:我的父亲被捕牺牲始末

瞿独伊是瞿秋白的独女。瞿秋白去世时,她只有14岁。5岁见到父亲,14岁听到父亲被杀害的消息,对于瞿秋白生命中最后时光,瞿独伊记忆犹新。

从1931年1月开始,我父亲就开始做各种文艺工作。共产国际开除了他,没工作了,就搞文艺工作。1934年初,父亲被派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而母亲则留在上海继续工作。母亲在后来《回忆秋白》的书中写下分离时的情景:“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走:‘之华,我走了!’”当时父亲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但是这一次可能等待见面的时间要长一点,所以他买了10个本子,说5本我拿着,5本留给你,因为在苏区不好写信了,你写信给我就写到这个本子上,我写在我的本子上,以后我们回来,可以交换着看。

父亲在苏区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他不仅是教育方面的工作,而且在文化方面也搞得很出色。写剧本、改剧本、参加演出,他都亲自参与。1939年5月,萧三到延安跟毛主席谈起父亲牺牲时说:“如果秋白还活着的话,我们延安的文化工作可以做得很活跃,可惜他牺牲了。”主席也觉得很遗憾。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得知此消息后,据说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父亲走,却遭到拒绝,患病给了“左倾”领导者留下了借口。根据张闻天的回忆,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高级干部是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三人团是周恩来、李德、博古三人。

后来周恩来也帮父亲说过话,秋白也应该带走。博古说,不带走,留着。父亲当时听说要留下来,当然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是还是服从组织决定。

中央红军出发那天,父亲把自己的一匹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

红军主力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后,国民党继续派重兵“围剿”苏区,留守的父亲在突围转移中被俘。被重赏通缉了11年的父亲终于“落网”,这对国民党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带领一支小分队在福建闽西山区游击转移的紧急突围的战斗中,何叔衡因年老体弱中途自杀,掉下悬崖被敌人机枪扫射中弹牺牲;邓子恢冲出包围幸免于难;父亲因长期患肺结核,躺在担架上翻山越岭难以支撑,邓子恢三番五次地叫他走,他说“我病到这个样,实在走不动了,你快走,我在这里不会被发现的”。在半山灌木丛中,父亲被敌人逮捕。

父亲被押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师长是宋希濂。宋希濂读过父亲文章,听过他的演讲。他称父亲为瞿先生,并且给予生活上的优待。

蒋介石派的国民党的特务,劝降劝了好久。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他,说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者担任大学教授就可以。

蒋介石曾经召集一些国民党的官员商议究竟怎么处置瞿秋白,说枪毙不枪毙,蒋介石和戴季陶都要枪毙他,蔡元培一个人说,不能枪毙瞿秋白,他是中华民族难得的一个人才。

父亲从二十多岁起,就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做了大量的探索、始创和初步系统化的工作。戴季陶曾讲:“瞿秋白亦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蒋介石发密令给龙溪绥署蒋鼎文,要求就地枪决瞿秋白,照相呈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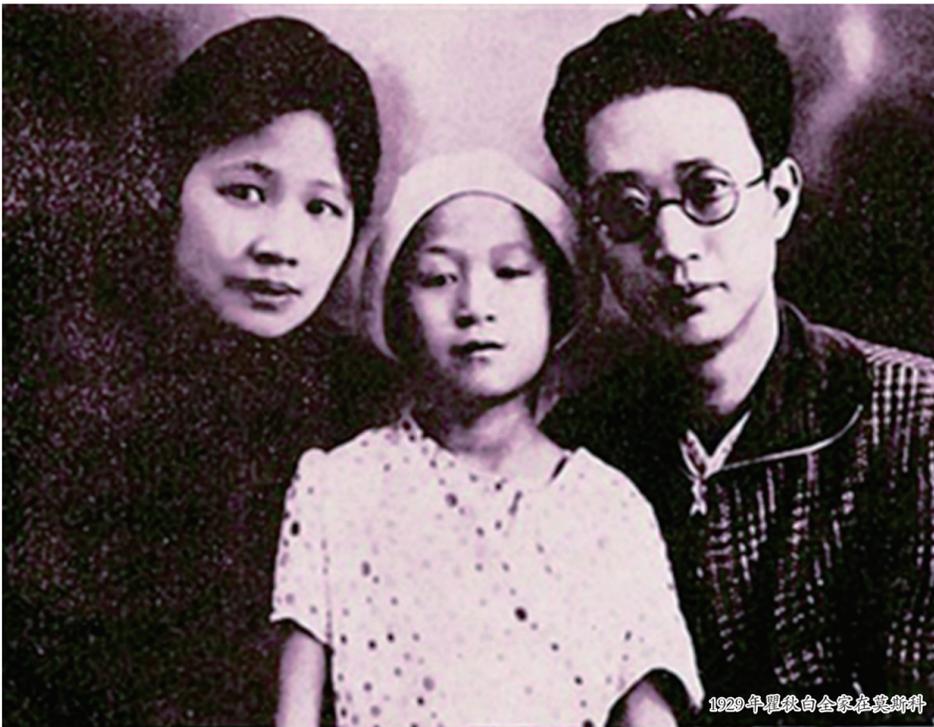
1935年6月18号要枪毙他,6月17号才通知了他。真正要枪毙那天,要他出来,他说等一会儿,我的诗还没有写完,他把诗的最后几句话写完就出来了,这就是他的绝笔诗,然后他署上“秋白绝笔”。父亲当时上身穿黑色对襟衫,下身穿白布低膝短裤、黑线袜和黑布鞋。黑上衣是母亲给他缝的,后来寻找尸骨时挖出来辨认时,她认得那个衣服的扣子。

父亲很坦然地走到中山公园,中山公园有个亭子,他站在那里照相,然后给他准备了四碟菜,他很坦然地喝酒吃菜,然后出来用俄文唱国际歌。国际歌就是他在北京堂兄家翻译的,翻译的时候他一边弹琴一边翻译。

父亲赴刑场很坦然,不像是赴刑场,没有一点紧张或是害怕。他还一边走一边抽烟。神态自若,街上人和记者看这场景都看不出是谁要枪毙的。他说,我有两个要求: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不能打我的头。

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意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我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不时地看向我,然后传给我其他同学看,唯独不给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于是,我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后来就晕倒在地。

我休克了,不能说话,不能动,还在哭,但是我听到别人说话。有人说,她不是死了,我想说我没死,但是又说不出来。老师就拿一瓶香水擦我全身,这样我才能动了。当时特别难受,就想妈妈以后怎么办,以后妈妈一定很痛苦。我就一直哭,吃不下饭。回到国际儿童院,我到晚上不能睡觉,得了失眠症,也影响到孩子们的休息。



1929年瞿秋白全家在莫斯科

完,老师骗我说带我出去玩,就把我带到莫斯科的儿童院人医院。之后,老师就扔下我走了。我一个日本小朋友知道老师要送我去那,就说:“她不是疯子,她就是想她爸爸。”在这个儿童院人医院,有些小孩把大便抹在墙上。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月,没有人管我,也没有人来看我,只有一个日本朋友给我来信说说情况,安慰安慰我……

父亲牺牲后,母亲第二次来苏联参加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就把我从疯人医院接了出来。母亲当时是在国际红色救济会中国部的委员,大会开完了以后,就留在苏联做这个工作。她去的时候很痛苦,因为那时父亲刚刚牺牲。晚上母亲拿出父亲写的信和文章看,在台灯底下,一边看一边掉泪。我就说妈妈你不要哭,爸爸已经过世了,你不要哭,我给你唱歌,我就一首一首地唱,唱了《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多俄文歌给她听。

父亲和母亲感情很深,他们的信写得很热情,说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独伊,就是常梦见你,经常想念你,我很想赶紧回来,回到莫斯科,看看你,抱抱你……

1935年到1941年,母亲一直在苏联工作,在那里王明又打击母亲,撤销她的工作,不给她生活费,让她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解决,生病也得不到治疗。1938年8月,党中央派任弼时接替王明的工作,母亲才被送到疗养院疗养,后来母亲去了共产国际的党校,可以一边学习一边休养,帮忙做翻译工作等等。

周恩来总理到苏联联手的时候,我和妈妈还去探望过,在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医院,临走的时候妈妈要求跟他一起回国,周恩来就让你继续养病,不要太思念秋白,把身体养好,再回去工作。(据《看历史》)

几十年来,王稼祥一见到聂荣臻,或者说起长征的事,就想起这袋“救命粮”。他说,这一袋粮食虽然可以用斤两来计算,但它包含的价值一辈子也受用不尽。

聂荣臻和邓小平有一种特殊的战友情。邓小平私下习惯称聂荣臻为老兄,聂荣臻则称他小平,彼此之间这样个亲切的称呼,一辈子都没变过。有一件事,邓小平到了老年还常常提起。

长征过草地前,在毛儿盖,邓小平从中央秘书长任上调到红一军团任政治部宣传部长,而红一军团的政委就是聂荣臻。两位四川老乡走到了一起,自然是异常高兴。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开始东征,邓小平随红一军团政治部参加了此次东征。继政治部宣传部长之后,邓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分管组织、宣传和教育工作。1936年5月18日,邓小平和聂荣臻、左权率红一军团奉命西征,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大西北,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后,邓小平和聂荣臻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建立了赫赫战功。

令人想不到的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1936年12月初,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2月14日,为政治部主任)的邓小平在甘肃庆阳得了严重的伤寒,昏迷不醒,什么东西也不能吃,生命十分危险。

聂荣臻得知后,非常着急。此时恰逢东北军和共产党红军搞统一战线关系张学良将军慷慨地送来两车慰问品,其中有一些是共产党人鲜见的没有吃过的罐装牛奶。

聂荣臻当即决定,为了救病重垂危、命悬一线的邓小平,一定要将所有的牛奶全部留给邓小平用。正是靠着这些牛奶,才挽救了邓小平的生命。(据《党史文苑》)

王副校长递过来的捐款箱,金春雨觉得那箱子沉甸甸比课桌上那摞高高的书本还要重。她觉得自己有些承受不住了。将身体靠在旁边的桌子上,才没有被坠倒。看一眼前黑压压的人群,她觉得有些心慌,有些透不过气来。匆忙低下头,脑海里突然一片空白,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弯下腰,冲着面前的人群,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雷鸣般的掌声,伴着照相机摄像机的不停闪烁,金春雨把捐款箱放回桌上,低头跑进了队列表里。

本来梅晓玫老师按照学校的安排,跟金春雨交待过,是要她说点什么的,金春雨当时也答应了。她非常感激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对她的帮助和照顾,如果没有他们,不用说她能参加竞赛,是否还能继续上学都是个问号。她想感谢学校领导老师同学的帮助,感谢社会上众多好心人的帮助。这一切,她和妈妈都是不会忘记的。她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大家对她们母女的帮助。最后,她还要深深地鞠一躬,表达自己不尽的感激。

可是,她竟然什么话也没说就回到了队列表里。她不知道自己今天到底怎么了。她很自责,自己怎么这样呢?这些感激的话,平时一直是在心里存着,她一直想找个机会表达的呀,机会来了,脑子却突然断电了,一片空白了。自己怎么这么忘恩负义呢?

站在队列表里,金春雨始终没有抬头,泪水悄悄地涌上来,一滴滴落在脚下的地上。

看着突然跑走的金春雨,王副校长和梅晓玫老师都有些诧异。可是,金春雨既然走了,也不好再把她喊回来。王副校长毕竟是位有经验的领导,他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他对着面前的人群鞠了个躬。

“首先,我代表榆树湾中学的全体师生,对各位的爱心捐赠表示衷心的感谢!金春雨同学本来是要对各位表示感谢的,但是连日来的备考,她很疲惫。我们各位也都是家长,我想大家是会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对待来理解的。金春雨同学这次参加省里的数学竞赛,考出了全省第九名的好成绩,这是我们榆树湾中学的骄傲,也是各位关心支持的结果。我们榆树湾中学建校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但我们团结进取的班子,有好学上进充满朝气的教师队伍,有刻苦勤奋的学生,有社会各界的支持。请各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清华北大的校园里,将有来自我们榆树湾中学走出的学生!这次省里的竞赛,我们学校的金春雨同学,在妈妈生病住院的情况下,考出了全省第九名的好成绩,实在是可喜可贺!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次竞赛,全省前二十名的学生里,也只有我们的金春雨是低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说,在这次数学竞赛中,别的参赛学生都是初三,只有我们的金春雨是初二。这说明了什么?我不说大家也一定很清楚的。虽然这次竞赛只有金春雨同学参加,但我们学校的同学中,还有很多的像金春雨一样优秀的学生。各位家长朋友,我们学校的办学宗旨是:送一个普通孩子,还你一个优秀人才!请各位家长放心把孩子送到榆树湾中学来,让我们的孩子,从这里走出去,走向更高学府,走向成功,走向未来!谢谢大家!”

王副校长的讲话,引来了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金春雨的泪水慢慢止住了。她觉得王副校长讲得太好了。当初小学毕业的时候,有两所中学都在她家居住的小区之内,之所以选择了榆树湾中学,是因为这里能住校,不用来回跑。现在,她觉得自己作为榆树湾中学的一名学生,很自豪也很光荣。

捐赠仪式结束后,各媒体的记者们又到女生宿舍楼下的那间小房子里去看望了金春雨的妈妈。(29)

许世友将军晚年在南京中山陵八号度过。早晨,打拳或锄草、种菜;上午,看文件、读书;下午,午休起床后,乘坐吉普车进山颠一圈。这是他独有的“散步”方式,不坐在车上颠上一颠,浑身就不舒服。接着,打猎或钓鱼……

许世友秘书李福海说,将军仍然关心国家大事。每天早上六点半的新闻要听,晚上中央台七点的新闻联播也要看。新闻联播完了后,如果是谈情说爱的片子,他扭头就走;如果是武打片,或戏剧片,他就坐下来看。《参考消息》他每天都看,看报也就看个标题。

许世友也喜欢在家看16毫米的小电影。他最喜欢的是几部老片子,如《地道战》《地雷战》《霓虹灯下的哨兵》《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刘三姐》《乔老爷上轿》等等,百看不厌。中央关于反对特殊化规定下达后,他不在家里放了。

李福海说,许世友将军晚年不喜外出交往,他走得最多的是富贵的“钱老”家。“钱老”者,即钱锺将军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与钱锺两人皆出自少林寺,情笃深,义更重。俩人耳朵均背,扯着嗓子交谈。你说东,他说西,答非所问,言不对题,然俩将军则津津有味。某日,许世友将军至钱家闲扯一个多小时,返回时间李秘书:“钱司令都说些啥?李福海言此忍俊不禁。”

许世友晚年很少到公共场所活动,因为他一到,别人都要站起来,还要握手寒暄,他感到不自在。而每年的国庆节、春节军民联欢会、文艺晚会,许世友一般都会出席。因为在这些活动中都会安排一场京剧,剧目有《龙凤呈祥》《空城记》《三岔口》《雁荡山》等传统剧目的折子戏,那是他的至爱。笔者多次在南京市长江路的人民大会堂军民联欢演出中,见到许世友将军。印象最深的是,每次都是许世友一个人坐在第一排位置上,左右两边都空空如也。谁都不敢靠近他,他也不理任何人。

1981年冬,在老家生活的长子许光与定春(许世友侄儿)到中山陵八号看望许世友将军。他们见到将军时,不禁大惊。许世友正在卧室里用自制木炭炉烧火锅,炖萝卜羊肉吃。许光问:“你不是有炊事员吗?”许答:“木炭烧的好吃,他们不会搞。”许光又见将军竟用装满热水的塑料袋裹腿,忙问:“咋啦?”将军答:“老寒腿,

许世友晚年趣事



关节痛,这样包起来好些。许光问:“为啥不上医院做理疗?”许世友答:“我的法子灵,他们不敢搞。”

许光临行时,许世友竟叫警卫员扛来一麻袋的地瓜,叫许光带回去吃,许光既为难又好笑:“爸,咱家不缺这。”许世友说:“这是我们自己种的,便宜,只要七分钱一斤。”许光说:“家里只要三分钱一斤呢!”此时的许世友沉默了,最后挥挥手说:“那就算了。”

1984年某日,许世友突然提出要到南京白水桥的“临汾旅”去看部队。1958年,毛泽东提出“军队干部下连当兵”的口号,全军干部热烈响应,其中有250名将军下连当兵,许世友首当其冲。他来到“临汾旅”五四七团E排六连当兵,与士兵同住、同操练、同劳动、同娱乐,约一月余。

据“临汾旅”五四七团二营六连干部回忆,其时,许世友司令已垂垂老矣,但一到“临汾旅”营区就兴奋起来,大步走向他曾当兵的六连二排宿舍,望来望去,似乎在寻找什么。团长、政委、营长教导员、连长、指导员不敢马虎,紧紧跟随其后。许世友回头问连长、指导员:“我的老班长呢?”连长、指导员一脸茫然。问营长、教导员:“我的老班长呢?”营长、教导员哑口无言。将军怒问团长政委:“你们把我的老班长弄到哪里去了?”

五四七团二营六连连长刘必虎与笔者言,此时,我们大家才醒悟,许世友问的“老班长”,是他二十多年前在六连当兵时的六班班长孙承仕,与将军是“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他们连忙解释说:“报告首长,我们都是1968年后入伍的,首长是1958年在这里当兵,老班长孙承仕早就转业了。”许世友闻言,沉默无语,郁郁不乐而归。(据《凤凰网》)

长征途中的一个小袋“救命粮”

在艰难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之间水乳交融,留下了不少感人肺腑的事例。

部队准备过雪山前,进入川西藏族地区后,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开始还能找到青稞,后来连青稞也找不到了。有的同志饿得没法,就从前面部队遗下的马粪中淘洗出一点没有消化的青稞麦粒,压碎烤熟了再吃。再后面的部队连马粪也难找到了,只得吃野菜、草根、树叶和树皮,直到吃身上的皮带、丢弃的皮马鞍和皮军鼓等。

王稼祥连伤带饿,原本就骨瘦如柴的身体更加虚弱,浮肿的脸颊蜡黄蜡黄。身边的同志看了,都急得背过脸去抹泪。

正在这时,忽然有人给王稼祥送来一个沉甸甸的小布袋,上面用墨笔写着三个大字“救命粮”,又一行字是“军委王稼祥同志收”。

王稼祥打开一看,竟是一小袋大米。多么珍贵的馈赠啊!既然是红一军团送来的,他猜想一定是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送来的。

果不其然,聂荣臻得知王稼祥身体太弱,急需营养,就将自己尽力节省下来的一点口粮,装人个小布袋,交给行军



中的部队,让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往后勤,一直送到军委总部。

捧着这袋经过无数同志的手,凝聚着战友心意的“救命粮”,一个同志饿得东倒西歪,却没有一个人中途拆开了袋子取出一粒粮,使这袋“救命粮”原封不动地送到自己手上,王稼祥泪眼模糊了。他深切感受到革命部队特有的阶级感情和共产主义战士共有的高尚情操。

为了迎接晚报记者的到来,学校组织了新一轮的捐款。这次捐款不像上次那样随意,是经过精心组织和策划的。学校派了专人,对以前曾跟他们联系过的学生家长和社会上的热心人进行了电话沟通,把活动的具体情况告诉他们。

那天是周末,学校开放的日子。和学校做过沟通的家长当然是有备而来。以前没有跟学校联系过的家长们,进门就看到了学校门口的大红横幅,上面写着:

“祝贺我校金春雨同学获得全省数学竞赛第九名的好成绩!”

“感谢社会各界及各位朋友对柴玉兰金春雨的支持和帮助!”

路边的宣传栏里,身穿榆树湾中学校服的金春雨怀里抱着几本书,有些羞涩地微笑着。那张被放得很大的照片旁边,是她的简介。

家长们看完那些照片和简介,纷纷朝人头涌动的操场走过去。虽然他们不认识金春雨,更不认识柴玉兰,但这两个名字及背后的故事他们是很清楚的。

报社、电视台的记者们来来回回地跑着,为场面的热烈而兴奋不已。金春雨被王副校长请到了队伍的前边。接过

Advertisement for a book titled '丁香季' (Dingxiang Season) by 鞠慧 (Ju Hui). The ad features a photograph of purple flowers and text describing the book as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about the growth of teenagers. The publisher is 济南出版社 (Jinan Publishing House).